

【学界往事】

□林建刚

# 赵俪生：历史学家的风骨

倘使学术环境更好一些，历史给这位学者更自由的环境来发挥他的天才，赵俪生的学术成就或许会更高一些吧！



作为人口大省，20世纪的山东，出了许多杰出的历史学家。这些历史学家当中，最有名的自然是傅斯年。他的讨宋子文、孔祥熙的政论檄文，直接导致了宋子文的下台。宋朝文人苏东坡在《潮州韩文公庙碑》中曾用“匹夫而为百世师，一言而为天下法”称许韩愈，用这句话来形容傅斯年，也恰如其分。傅斯年之外，历史学家赵俪生也是一位很有成绩的历史学家，学术之外，他为人处世的故事也让人津津乐道。

赵俪生原籍山东安丘，隶属潍坊，生于1917年，当时，他的山东老乡傅斯年刚登上历史舞台，成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弄潮儿。赵俪生家境贫寒，幸好那时候的农村与城市可以自由流动，在他10岁那年，为了生计，他的母亲带他逃荒，来到了青岛。在青岛，赵俪生勉强接受完初、高中教育。为养家糊口，高中时期，他就有意地翻译文章投稿来赚取稿费，以贴补家计。

虽然民国时代充满着愚昧、贫穷与落后，但在教育方面，基本的公平还是有的。高中毕业之后，一穷二白的赵俪生决定去北平投考大学。凭借自己的努力，这个贫苦乡下的学生考上了清华大学，鲤鱼跳龙门，一举改变了自己的命运。

在清华，赵俪生接受了良好的教育。杨树达是他的中文老师，吴宓是他的英文老师，冯友兰是他的哲学史老师，张申府是他的逻辑学老师。在众多教师中，他最佩服的是闻一多。闻一多的《诗经》、《楚辞》研究给了他很大的思想启迪。晚年的赵俪生，学术转向先秦文化史，可能就是受闻一多的影响。

研究民国知识分子的学者谢泳，喜欢以学生运动来划分20世纪的中国知识分子，如果说傅斯年是典型的“五四”学生一代，那么，赵俪生则是典型的“一二·九”学生运动一代。

在上世纪30年代，最牵动学生心扉的，无疑是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为了逼蒋抗日，中国共产党发起了“一二·九”学生爱国运动。对学生运动，赵俪生是积极的。当时，清华大学的领袖是蒋南翔，看到赵俪生如此积极，蒋南翔专门跟他谈了话，希望发展他入党。赵俪生经过深思熟虑，对蒋南翔说：“我走不成布尔什维克的道路，我受不了严格的组织性和纪律性。我愿意做一个全心全意的马克思主义的信仰者，同时是一个自由主义者。”

这段话，典型地体现了赵俪生的矛盾冲突。一方面，他赞同马克思主义，是坚定的马克思主义的信仰者。另一方面，他

又有知识分子的书生意气。革命是需要纪律来约束的，当革命需要他牺牲个人的时候，赵俪生又对自由过于留恋。终其一生，赵俪生都在革命与自由之间摇摆拉锯。

“七七事变”后，赵俪生参加了抗日战争，并一度去了延安。这一时期，他利用两位叔父都是民主人士的优势，与国民党展开文化斗争。抗战胜利之后，倾向共产党的赵俪生在华北大学教书。在这期间，赵俪生与成仿吾曾发生龃龉，从中可以看出赵俪生的个性。

当时，北平即将和平解放，中宣部副部长周扬传达中央命令，要求华北大学接管中宣部和文化部门的任务，并对此组织讨论。讨论地点设在了吴玉章校长的大厅里，群贤毕至，讨论热烈。

在关于北平各大专院校教师都要到军管会的文管会报到并办理登记的问题上，出现了很大分歧。有人主张，不管年龄老少，全要亲自前来报到；有人觉得不太实际，还举眼睛看不清楚的陈寅恪为例，建议身体不好的可由家属、朋友代替报到。

这时，时任副校长的成仿吾操着湖南口音声音豁亮地说：“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到无产阶级领导的革命机关来报到，来办理登记，一定要亲自来，本人来，不得由别人代替，因为……这是个态度问题！”成仿吾的这句话，让赵俪生非常生气。他觉得自己所做所为，完全是把自己当做征服者，把知识分子当做被征服者，进而要求他们出来迎降臣服。

听不下去的赵俪生发言了，他以十月革命后列宁优待俄国的知识分子的往事做例证，指出当时的俄国知识分子比中国的知识分子嚣张得多。在面对知识分子的谩骂时，列宁不但不同他吵回他骂，反而带着东西去看望他们，等其回心转意，为苏维埃共和国工作。赵俪生说，这值得我们大家学习。还特别提高嗓音说：“特别值得成校长学习。”顿时，现场鸦雀无声。严词批驳了成仿吾的赵俪生很快接到了调离华北大学的通知。

照理说，吃一堑长一智，有了这次教训之后，赵俪生应该循规蹈矩了吧。毕竟，前事不忘后事之师。然而，赵俪生性格中的书生意气很快再一次发作了。这一次，他得罪的是郭沫若。

新中国成立后，赵俪生被分配到中国科学院编译局，负责编译工作。当时中国科学院的院长是郭沫若，开院务会议时，赵俪生亲眼看见郭沫若拍着桌子训斥吴有训和陶孟和。他回忆说：“吴有火性，不服，跳起脚来同他吵；陶则安安稳稳地承受这种凌辱，其状甚惨。”

要知道，吴有训是民国时期第一流的物理学家，而陶孟和则是民国时期第一流的社会学家。郭沫若的所作所为与成仿吾的行事作风颇为一致。对此事看不惯的赵俪生再次站出来，为吴有训与陶孟和鸣不平。结果，赵俪生最终被迫辞职，要不是艾思奇介绍他去东北师范大学教书，赵俪生就成失业人员了。再后来，在各种政治运动中，赵俪生总是管不住他的书生意气，而吃亏的，永远是他自己。一顶右派的帽子，差一点让他家破人亡。

赵俪生最好的时光是在他的晚年。改革开放的新时期之后，赵俪生在兰州大学得到了发挥的机会。当时的兰州大学非常尊重他的意见。当年秦晖报考赵俪生的研究生，初试、面试都好。但是秦晖的视力非常不好——先天性青光眼，右眼失明，左眼视神经萎缩，裸视力0.2，矫正视力也仅0.7。对此，学校相关部门有不录取秦晖的打算。赵俪生知晓后，表态说：“如不招秦晖，我一个也不招了……秦晖就是失明，也可以成为又一个陈寅恪。”最终，兰州大学招了秦晖，而秦晖也成为我们这个时代第一流的学者。赵俪生的学术眼光，不得不让人佩服。

面对20世纪下半叶的历史学者赵俪生，我常常在想：倘使学术环境更好一些，历史给这位学者更自由的环境来发挥他的天才，赵俪生的学术成就或许会更高一些吧！

(本文作者为文史学者)

唐太宗热爱艺术，经常与虞世南、欧阳询、褚亮等人讨论书法，万机之暇，留心翰墨。他尤其喜爱王羲之的书法，亲自为《晋书·王羲之传》写了一段传论，一一点评了秦汉至六朝时期书法史上的诸多大家。最后说，纵观古今，堪称尽善尽美者，也就王羲之一人。皇帝遍览古今大家真迹，无人能敌，看得多，又懂得多，说出口来就是权威。《王羲之传论》因此成为史上最有战斗力的艺术评论，一举奠定了王羲之在中国艺术史上的“书圣”地位，唯我独尊，没有之一。世上所传王羲之的书法几乎被皇帝搜罗净尽，但王羲之最为著名的作品却遍寻不得，那就是《兰亭序》。

《兰亭序》是王羲之酒酣之后的神来

【宣纸上的故事】

# 萧翼赚兰亭

□李北山

之作，据说第二天酒醒，他自己看到《兰亭序》，都震惊不已，重写几十乃至上百遍，却都写不出那天的神韵。他因此十分珍爱，成为他的传家之宝。传之于子孙，传到第七代孙王法极，这王法极却出家做了和尚，就是中国艺术史上著名的智永禅师。智永禅师将《兰亭序》传给了弟子辩才。

李世民命人四处打听《兰亭序》的下落，最后线索都指向了越州永欣寺的住持辩才。皇帝三次宣辩才入宫中道场，优待有加，旁敲侧击地询问《兰亭序》的下落，辩才却一口咬定自己没有，直说不知所终。唐太宗只好放他回越州。强夺不行，只能智取，宰相房玄龄就给皇帝推荐了萧翼。这萧翼出自兰陵萧氏，是梁武帝萧衍的玄孙、梁元帝萧绎的曾孙。当时是唐太宗的监察御史，向以才华横溢、足智多谋著称。

萧翼借了皇帝几幅二王书帖，又带上家传的《职贡图》，打扮成一个山东人就出发了。萧翼为什么打扮成山东人？大概原因有三：一则他祖上是山东人，有此便利；二则王羲之祖上也是山东人，这容易博得辩才的好感；三则，山东乃孔孟之乡，仁义礼智信，口碑好，牌子硬，易获信任。

辩才回到永欣寺，每日向佛，心如止水，偶以琴棋书画自娱。一天，日暮时分，寺里来了一位香客，和辩才“偶遇”。寒暄一番，很是谈得来。辩才就请他进房用茶，二人下棋抚琴，谈天说地，评文述史，探讨书法，甚是投机，相知恨晚，通宵尽欢，自此成了好友。一次，萧翼拿来一幅自己的藏画请辩才欣赏，竟是梁元帝萧绎的《职贡图》，辩才激赏不已。萧翼说：“弟子祖上传下来不少二王的书法，弟子从小就喜欢赏玩，现在还随身带着几幅呢。”辩才看了说：“果然是真迹，但不是最好的。贫僧倒是有一真迹，很是非同寻常。”萧翼问：“是什么？”辩才答：“兰亭。”萧翼听了大笑说：“数经乱离，这《兰亭序》怎么可能还有真迹在？一定是伪作。”辩才一听急了，立马从屋梁的一个洞内取出一帖，赫然竟是《兰亭序》。

自从给萧生看了《兰亭序》后，辩才就不再将它藏在梁上，还借来萧生手中的二王书帖，每日临学不辍。萧生也经常往来。一天，辩才禅师外出，萧生前来，跟寺院的小沙弥说昨日将手绢忘在禅房中。小沙弥一看是禅师的好友，就给他开了门。萧生入内，径直取走了案几上的《兰亭序》和皇帝的二王书帖。

唐太宗得《兰亭序》后，命赵模、韩道政、诸葛贞、欧阳询、褚遂良、冯承素、杨普彻和薛稷等人各摹，拓数本以赐皇太子及诸王近臣。后来，《兰亭序》的原迹给唐太宗陪葬了。

大画家阎立本把这个故事画了出来，就是著名的《萧翼赚兰亭图》卷。根据台北故宫博物院宋人摹本，此画绘有五人，辩才居中盘坐在椅子上，他的对面就是萧翼，还有一个僧人侍坐一旁，左下有二人在煎茶。画中辩才长眉圆颊，嘴巴微启，面露微笑，手持拂尘，盘坐在禅榻木椅上，似正侃侃而谈，十分投入。而儒生装扮的萧翼，一双凤眼，眉毛上扬，面带机心，似乎满腹心事，双手笼在袖子里，躬身坐在长凳上，屏气凝神地倾听。《萧翼赚兰亭图》在宋及以后多被反复临仿。史载元钱选、赵子俊以及明仇英等皆绘过《萧翼赚兰亭图》。

一段关于艺术，关于热爱，关于智谋的故事，萧翼赚兰亭，这件中国艺术史上的千古奇案，因唐人何延之写《兰亭记》和阎立本绘《萧翼赚兰亭图》卷，而传之于后世，并以历代的摹写、描绘而生发出生生不息的魅力。

(本文作者为艺术学者)

【三声楼读记】

□虞云国

# 从书斋名说起

承蒙“青未了”的厚意，让我取个栏名，写点东西。踌躇了一下，就叫“三声楼读记”吧。但“必也正名乎”，总得说些理由。读书人爱给书房取个雅名，其风盛自宋代。刘禹锡有《陋室铭》，说其中“可以调素琴，阅金经”，金经是泥金写的佛经，这陋室应是他的书房。但“陋室”即简陋的房室，并非书斋别称，可见自名书斋，至少中晚唐还不风行。但及至南宋，徐光溥已编了一本《自号录》，专录宋代士大夫的自号，“亦可以品量其器业之宏狭”。其“斋”、“庵”、“轩”、“寮”等类别中，多是书斋名，著名的有米芾“宝晋斋”，朱熹“晦庵”，辛弃疾“稼轩”。

“三声楼”也算我的书斋名吧。五十年前，我正读初中，课余借了一册《燕山夜话》看，有篇《事事关心》介绍顾宪成写的对联，认为“表示了东林党人在政治上的抱负”。这副对联，我特别喜欢而不过目不忘：“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不料两三年后，姚文元发表《评“三家村”》，把《燕山夜

话》定为“最刻毒的借古讽今、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论”。《事事关心》也遭到批判：“东林党是明代地主阶级内部的‘反对派’，邓拓这么欣赏‘东林党人在政治上的抱负’，是因为‘反对派’引起了他内心的共鸣。”对当时说邓拓“反党反社会主义”，作为中学生的我还难有洞见，却觉得对联倡导关心国事、天下事并没有错。伟大领袖还教导“要关心国家大事，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呢！

“文革”期间，没去广阔天地接受再教育，呆在城里吃干饭。家里有个小阁楼，老上海弄堂常见的那种，算是我的起居室。搁架上有限的几本书，就是全部精神食粮。上世纪70年代初，我为这个“一丈多方，三尺来高，欲立碰头”的空间取了个“一心三声楼”的雅称，还请同窗篆写了方印。“三声”即“风声、雨声、读书声”，“一心”即“家事、国事、天下事”关乎一心。“文革”期间，我竟然还念兹在兹这副对联，足见其“流毒”之深。

“文革”过后，读到邓拓诗词，才知他对这副名联情有独

钟。1960年，他有《过东林书院》诗云：“东林讲学继龟山，事事关心天地间。”《事事关心》写在次年八九月间，应是继这首诗有感再发的。该文之后，他在两年后赠友人诗里又说：“当年风雨读书声，血火文章意不平。”显然仍用“风声雨声读书声”之典。对联倡导而邓拓推崇的，正是自古以来中国士大夫以天下为己任的精神，他作为共产党内知识分子继承了这种传统，原应视为优秀文化传承有序、后继有人，孰料却都以“革命”的名义被踩成了齑粉。

上世纪的最后一年，我到无锡讲课，特地去了趟东林书院。北宋学者杨时(号龟山)创始的这座书院，明末因东林党人讲学论政而声名大噪。暮秋夕阳里，只有我一个凭吊客，踟蹰在修葺一新的讲堂、园林间，在依庸堂里见到了那副名联。想到东林党人的命运，也想到邓拓的遭遇，还回味了自己与这副名联的因缘，在归途写了四句诗：

先贤胜迹独追寻，  
家国文章天下心。  
蹉跎沉思斜照里，

明朝犹许党东林。

进入新世纪，我也迁居高楼，比起那小阁楼，读书环境已今非昔比。今年，另一位治印的友人要为我刻书斋印，盛情难却，沉吟一下，还是让他另刻了一方“一心三声楼”印。我想，时代尽管易变，读书人总该有点“家国文章天下心”的情怀吧！

最后说说“读记”。栏名“读记”，并非《太平预览》引《博物志》所说“圣人制作曰经，贤者著述曰记，曰章句，曰解，曰论，曰读”的意思。那种“读”与“记”，都是贤者学习圣人经典的读后感，我哪配得上！我的“读记”，用意直白，即“阅读”与“笔记”两个动词的合成，也就是将阅读的感兴记录下来，如此而已。当然，阅读的对象是广义的，不妨读书、读史、读人、读世；记下的内容不拘一格，可以是关乎家国的时评，或许是兼及文史的小品，也不妨是一得之见的书话。

(本文作者为上海师范大学博士生导师、中国宋史研究会理事)